

WHAT IS THE WHAT

Dave Eggers

陈伟译
「美」戴夫·艾格斯 著

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美」戴夫·艾格斯 著
陈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hat is
the
Danger
What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808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什么/〔美〕艾格斯著;陈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24-1

I. ①什… II. ①艾…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6352 号

DAVE EGGERS

WHAT IS THE WHAT

Copyright © 2006 Dave Egger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责任编辑: 姚翠丽
装帧设计: 颜 禾

什么是什么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陈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424-1

定价 35.00

前言

从在马里尔拜^①被迫与亲人分离,到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难民营中度过的十三年,再到在亚特兰大经历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突,以及在各地得到的慷慨帮助、遭遇的种种挑战,《什么是什么》是我人生最真切的记录。

读了这本书,你将对我以及我深爱的苏丹人民有所了解。持续二十二年的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组织/解放军^②之间的内战开始时,我还是个小孩。无助之中,我长途跋涉,穿越众多饱受蹂躏的地区,被苏丹空军轰炸,躲避地雷,逃过野兽和人类的捕杀,最终幸存下来。我靠着吃不知名的水果、野菜、树叶过活,有时数天吃不到东西,多次濒临绝境。我一度以为全世界对落到我和南苏丹人民身上的不幸命运都视而不见。我的很多朋友和成千上万的同胞,都没能逃过这场劫难。愿上帝赐予他们永恒的安宁。

本书所记述的我的抗争之路,部分内容最初曾通过演讲的方式与公众接触过。我对很多听众讲述过经历,但还希望世界能了解我生活的全部真相。二〇〇三年秋,我对亚特兰大“迷途少年基金会”的创始人玛丽·威廉姆斯说,除了公众演讲,我还想以书的形式把生命历程告诉更多人。因为我不是作家,我问玛丽能不能替我联系一位作者,帮助我写自传。玛丽联系了戴夫·艾格斯,感谢上帝,我们见面后,立刻成了好朋友。我们达成一致,这本书的所有收益都归我所有,用以改善苏丹和其他地方苏丹人的生活。

经过多年努力,戴夫和我通过各种方式合作讲述和记录故事,比如

001

① 马里尔拜,南苏丹北巴赫尔-加扎勒州的一个村庄,瓦伦蒂诺的故乡。

②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成立于一九八三年的苏丹南部地区反政府武装,前者为政治机构,本书中使用简称“苏人运”(SPLM);后者为军队,本书中使用简称“苏人解”(SPLA)。

用录音带、电子邮件、电话交流，还有多次面见访谈。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我们甚至一起去了苏丹，我也得以重回七岁就离开的那个村庄。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戴夫，通过这些材料，他创作了这部作品。

读者应当明白，这本书中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年幼，所以我们不得不称《什么是什么》为小说。比如说，我无法重现十七年前的对话。但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所有重要事件都是真实的。这本书准确依照历史，书中所描绘的世界与我所认知的世界并无多少不同。书中最恐怖的事，在我们的时代也会发生，并且大多情况下也确实发生了。例如，从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到二〇〇五年一月九日，超过两百五十万人死于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原因；南苏丹四百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到国内其他地方；接近两百万人到其他国家避难。

我想完成这本书是出于信仰和对人性的信念，想帮助人们了解苏丹在全球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状态。我的经历是苏丹历届政府对自己民众所作所为的见证，戴夫和我把它写了出来，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感到很欣慰。虽然二〇〇五年的《全面和平协定》^①给了南苏丹重建机会，以及二〇一一年通过全民公投脱离苏丹的机会，然而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在这个国家的达尔富尔地区仍在持续。

我很幸运能活到现在，将这些告诉大家，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深信终有一日能将经历告知读者。此书是一种抗争，使我的精神奋战不休。奋斗，提升我的信仰，鼓舞我的希望，坚定我对人性的信念。既然你我同在，我们携手一起，一定能改变这个世界！感谢您阅读《什么是什么》，祝您生活幸福！

瓦伦蒂诺·阿沙克·邓

二〇〇七年于宾夕法尼亚阿勒格尼学院

① 二〇〇五年一月九日，苏丹政府与苏人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定》，被视为第二次苏丹内战的结束。协议规定，六年过渡期满后，即二〇一一年一月，南方人民将就与北方统一还是独立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

目 录

- 001 前言
- 001 第一部 埃塞俄比亚之路
- 207 第二部 皮尼亚多
- 327 第三部 卡库马

第一部

埃塞俄比亚之路

我没理由不应门，就过去开门。门上没有观察来客的猫眼，我直接拉开门，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高壮的非洲裔美国女人，比我大几岁，穿着红色尼龙运动衫。她大声问我：“有电话吗，先生？”

她有点眼熟。我几乎能肯定，一小时前从便利店回来时在停车场见过她。当时我看见她站在楼梯旁，向她笑了一下致意。我回答她说有电话。

“我的车在街上抛锚了。”她说。我发现她身后的天色快黑了，大半个下午我都在学习。“我可以用你的电话报警吗？”她问。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需要修车时想报警，但同意了。她走进来，我想关门，可是她拦住了。“一会儿就好。”她说。我觉得让门开着有些不妥，但既然她这么要求，我就照办。这是在她的国家，不是我的。

“电话在哪里？”她问。

我告诉她电话在卧室，话音未落，她就从我旁边冲了过去，壮实的身影闪过客厅，尼龙衣服嗖嗖作响。卧室门关上了，咔嚓一声上了锁。她把自己锁在了我的卧室里！我正想跟上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说话。

“站在这里别动，非洲人。”

我转身看到一个非洲裔美国男子，穿着肥大的浅灰蓝色棒球外套和牛仔裤，脸被棒球帽遮住，看不清楚，一只手按着腰上的什么东西，像是要提住裤子。

“你们一起的？”我问他。我还没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点生气。

“坐下，非洲人。”他冲沙发点了点头说。

我站着不动：“她在我卧室里做什么？”

“给我坐下！”他恶狠狠地说。

我坐下后他露出枪柄让我看，原来他手里一直握着枪，我早该反应

过来的。然而我什么都不知道，该知道的事我总是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这是抢劫！我真想身在别处！

说来奇怪，此刻我希望的竟然是回到卡库马。卡库马从不下雨，每年有九个月刮大风，八万名从苏丹和其他国家来的战争难民每天靠一顿饭过活。但此时，女人在我的卧室，男人用枪指着我。我只希望我身在卡库马，即使在那儿我住的是塑料布和沙袋搭的棚屋，只有一条裤子。我不能肯定卡库马的难民营里就没有这种犯罪，但我想回去。甚至去皮尼亚多也成，那是在卡库马难民营之前住过的埃塞俄比亚营地。那里什么也没有，每天只吃一两顿饭，但在那儿我有自己小小的乐趣。我那时是个小男孩，很容易忘记自己是难民，离家千里，营养不良。无论如何，若说这是惩罚我想离开非洲的自大，惩罚我想在大学里避难、融入美国社会的美梦，我现在是经历磨炼了。我认错，我会回以低首鞠躬。我为何要对那个女人微笑？因为这笑已是条件反射，已成为习惯，我一定要改掉这种只能招致报应的习惯。来美国后，我多少次卑躬屈膝，以致开始幻想有人在拼命地向我传递一条信息，那就是“离开此地”！

我刚开始后悔和退却，心中又升起抵触。这种新的姿态让我挺直腰杆，开口对这个身穿浅灰蓝色外套的人说：“你们两个，请离开这里。”

浅灰勃然大怒。我搅了局，我的话给他们进行中的抢劫制造了一点障碍。

“你在叫我做事？操你妈的！”

我瞪着他的小眼睛。

“你说，非洲人！你在叫我做事？操你妈的！”

女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在卧室里喊：“你应付不了他吗？”她同伙被我惹火了，她被同伙惹火了。

浅灰把头歪向我，眉毛一扬，向我走近一步，作势指了指皮带上的枪，似乎准备使用。但忽然间他肩部一松，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放慢呼吸，控制情绪。再抬起头时，他恢复了原状。

“你是非洲人，对吧？”

我点了点头。

“很好，那我们是兄弟。”

我可不愿赞同。

“既然是兄弟，那我要给你上一课。你不知道不应该给陌生人开门吗？”

这个问题让我嘴角抽搐。单单是抢劫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接受。我见过抢劫，也被抢过，虽然严重程度不及这次。来美国之前，我最值钱的财产是睡觉用的床垫，被抢的东西都微不足道：一次性相机、凉鞋、一令打印纸。那些东西当时对我也是有价值的，但现在我拥有电视机、录像机、微波炉、闹钟，以及不少生活用品，全是亚特兰大的桃树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提供的。有些是二手的，多数全新，都是别人匿名捐赠的。每天看到它们，用到它们，我都身体发颤——这是我表达感激的身体语言，奇怪但真诚。但我预感，几分钟之内所有这些礼物都会被夺走。我站在浅灰面前，在记忆中搜寻上一次因粗心大意而被掠夺，感受这种罪恶是在何时。

浅灰一手握住枪柄，另一手按上我的胸膛：“为什么不给我坐下瞧着？”

我退后两步，坐在沙发上。沙发也是教会送的礼物。我和阿科尔·阿科尔搬进来那天，有个穿着扎染衬衫的苹果脸白种女人送来的，她还道歉说没在我们到之前送到。教会的人经常道歉。

我抬头盯着浅灰，他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曾射杀我两个同伴还差点杀了我的埃塞俄比亚女兵。她眼中也有一样的狂暴光芒，起初还装模作样让我们以为她是救星。那时我们正在逃离埃塞俄比亚，背后有数百埃塞俄比亚士兵追赶我们。他们朝我们射击，鲜血染红了吉罗河河水。那个女兵从高高的草丛中现身，“过来，孩子们！我是你们的母亲！过来！”灰草丛中她只探出头，伸出双手。我犹豫了。我在血河岸边碰到的一起逃跑的两个男孩朝她走了过去。等他们走到足够近，她

举起一支自动步枪射穿了他们的胸腹。他们倒在我面前，我转身就跑。“回来！”她继续喊，“回到母亲身边来！”

我在草丛里跑了一天，最后找到了阿科尔·阿科尔。后来我们一起发现了安静宝宝，救了她。那段时间，我们把自己当成了医生。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十岁，也许十一岁，要确定这点已不可能。我面前这人，浅灰，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事。他不会感兴趣。想到那天我们被埃塞俄比亚人驱赶回苏丹，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河里，我有了反抗公寓里这个男人的勇气。我又站了起来。

那人看着我，好像一个父亲被孩子逼得不得不去做感到懊悔的事。他离我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有类似漂白剂的化学品味道。

“你要——你要——？”他闭紧了嘴，停了一下，从腰间掏出枪，反手挥出。我眼前一黑，上下牙撞到一起，天旋地转。

我一生中被很多种方式袭击过，但还从来没被枪托打过。我看到别人受难比我自己受难更多，这是幸运，但即使如此，我挨过饿，被棍棒、扫帚、石头还有长矛打过，搭乘过堆满尸体的卡车，看过无数年幼的孩子死在沙漠里，有些仿佛坐着睡着了，有些死前疯了好几天。我见过三个男孩被狮子拖走，被吃得七零八落。我看到他们被那野兽叼在嘴里，拖去草丛中吞食，这近在咫尺，我都能听到肌肉被撕碎时发出的吧嗒吧嗒的声音。我还近距离目睹好友死在一辆翻了的卡车上，眼睛朝我睁得大大的，生命正从看不见的洞中流失。但现在趴在沙发上，手上鲜血淋漓，我发现自己在怀念非洲的一切。我怀念苏丹，怀念西北肯尼亚寂寥的灰色沙漠，怀念埃塞俄比亚黄色的不毛之地。

我只能看到攻击者的背部和手。他又把枪放什么地方去了，双手抓起我的衬衫和脖子，把我从沙发扔到地毯上。我仰面倒下，后脑撞上桌子边缘，两个玻璃杯和一个闹钟收音机掉了下来。我倒在地上，脸上血如泉涌，但稍感安慰，觉得他大概会就此打住。我已经太厌倦了，仿佛只要闭上眼睛，面前的一切都会结束。

“闭上你的臭嘴！”他说。

这句话听起来色厉内荏，这给了我一点安慰。我发现他不是狂人，并不想杀我，也许只是受那个在我卧室里翻箱倒柜的女人指使。她似乎是带头的，但只关心我房间里的东西，摆平我是她同伙的事，这可不难。他似乎也不想给我更多的伤害，于是我放松了，闭上眼休息。

我厌倦了这个国家。虽然我感激，是的，我曾经珍惜在这里度过的三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现在已心灰意冷。我来到这里，我们四千个人带着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来到这里，渴望着和平、大学教育，还有安全的环境。我们期盼这片土地没有战争，远离悲惨。我们兴奋过度，迫不及待，想立刻拥有一切，住所、家庭、大学，能寄钱回家，高等学位，最后，还想有点影响力。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改变仍然来得太慢，仍然一团乱麻——五年了，我仍然没攒够学分去申请四年制大学。我们在卡库马等了十年，不想在这里也等十年，盼望能尽快抵达下一站。然而多数人都没等到。过渡期间，我们有了不少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做了很多杂工，目前在一家健身俱乐部做前台接待，上最早的轮班，办理会员登记手续，向潜在会员介绍俱乐部的好处。这工作并不光彩，但很稳定，很多人不懂这种稳定的重要。无数人倒了下去，无数人自认失败。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做出的承诺无法兑现，这让我们很多人都堕落了。还有，我曾认为可以帮助我远离失望、超越尘俗的苏丹女人的榜样，塔比莎·杜安妮·阿科，去了。

他们进了餐厅，又进了阿科尔·阿科尔房间。我躺在地上，盘算他们能从我这里抢走什么。想到我的电脑放在汽车里将逃过一劫，我有些高兴。可是阿科尔·阿科尔的新笔记本电脑就没法幸免了。这是我的错。阿科尔·阿科尔是亚特兰大年轻难民领袖人物之一，电脑丢了，恐怕很多他需要的资料也就没了，包括所有的会议记录、财务记录、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我不能让这么多东西被偷走！阿科尔·阿科尔从埃塞俄比亚就和我在一起，我带给他的只有不幸。

在埃塞俄比亚，我曾与一头狮子对视。那时我大约十岁，被派去森林里捡木柴，狮子从树后悄悄潜近。我逃跑前有一刻呆立不动，那一刻

如此漫长，足以让我记住狮子的脸，一双死亡之眼。它在后面咆哮，但没追上来。后来我喜欢将这归结为它觉得我是个难对付的敌人。我曾面对狮子，也曾十多次面对全副武装的阿拉伯民兵的枪口，他们骑在马背上，白色长袍在阳光下闪亮。我一定能阻止这两个小毛贼！我又站了起来。

“他妈的，躺下！”

我的脸又撞上了地面，他开始踢打我，先踢肚子，再踢肩部，骨头撞得疼痛难忍。

“他妈的尼日利亚杂种！”

他似乎乐在其中，这让我担心。人开心时常会失误，会犯错。他踢了我肋部七脚，又朝我屁股踢了一脚，然后停下来。我吸了一口气，估量一下受的伤。不是特别重。我蜷在沙发角落，决定一动不动。我终于向自己认输，我从来就不是战士。我很多次从绝境中幸存下来，但从未与人近身搏斗。

“他妈的尼日利亚人！这么笨！”他胸膛上下起伏，手搁在弯曲的膝上，“怪不得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还活在石器时代！”

他又踢了一脚，比前几脚轻，但正中太阳穴，我的左眼顿感一片白光。

在美国我也被叫过尼日利亚人——那一定是美国人最熟悉的非洲国家——但我从未被踢过。但我见过这样的事，在苏丹和肯尼亚什么样的暴力方式我都见过。我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难民营里住过好几年，见过两个年约十二岁的男孩打架，他们打得异常激烈，最后一个把另一个踢死了。当然他本来并不想要对方死，但当时我们年幼体弱，几星期没好好吃饭的人是没法打架的。死掉的男孩身体原本就经不起一点儿外伤，脆弱的肋骨扯紧了皮肤，已保护不了心脏。他还没倒地就断了气。事情发生在午饭前，孩子被运去埋到沙土地，之后我们吃了炖豆子和玉米。

我决定闭口，只等浅灰和他的同伙离开。他们不会逗留很久，很快

就会带走所有想要的。我能看到他们在餐桌上打包准备带走的一堆东西：电视机，阿科尔·阿科尔的笔记本电脑，录像机，无绳电话，我的手机，还有微波炉。

天色渐暗，两位客人在我们公寓已有二十分钟上下，而阿科尔·阿科尔要几小时之后才会回来，如果他还回来的话。他的工作和我以前做过的一份差不多，是在一家家具展示店的后屋整理寄送给室内装修者的样品。即使不上班，他也不常在家。阿科尔·阿科尔多年没有女伴，这回找到了女友，一个叫米歇尔的非洲裔美国女孩。她很可爱。他们在社区大学的课堂上相识，那是阿科尔·阿科尔无意间注册的一个绗缝课程。他走进教室，恰好坐在米歇尔身边，从此再不离开。她身上有一种橘香，香味芬芳。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少见到阿科尔·阿科尔。有段时间我对塔比莎也抱有同样的想法，我想象我们在筹划婚礼，生一堆像美国人一样讲英语的孩子。然而塔比莎那时住在西雅图，这些计划太遥远了，也许我只是将此事浪漫化了。这在卡库马时也有过，那时我失去了一位挚友，我觉得如果我对他好一些，本可以救他的。然而如今大家都消失了，无论谁在爱着他们。

搬运我们财产的工序开始了。浅灰用手臂当托架，他同伙把东西往上堆——先是微波炉，然后是笔记本电脑，接着是立体声音响。东西堆到他下巴后，女人走到前门，打开了门。

“他妈的！”她说，一边迅速关上门。

她告诉浅灰，外面停车场上停了一辆警车，那辆车挡了他们车的道。

“他妈的！他妈的！”她口沫四溅。

他们先是一阵惊慌，过了一会儿站到窗户的窗帘两侧，往院子里看。我从他们的对话中推断出，警察正和一名拉美男子谈话，但肢体姿态显示事情并不急迫。女人和浅灰越来越有信心，警察不是冲他们来的，便松了口气。但警察为什么还不走？他们想弄明白这点。“那个狗

娘养的怎么不去干自己的事？”女人问。

他们安定下来等待。我前额似乎不流血了，我用舌头探了一下嘴部的伤口，下牙床的一颗门牙掉了，一颗臼齿碎了，感觉凹凸不齐，就像起伏的锯齿形山脉。但现在不是担心牙科问题的时候，我们苏丹人也不是以整齐的牙齿闻名的。

我抬头看到女人和浅灰拿着我的背包，包里除了我在佐治亚州佩雷米特大学的作业之外别无他物。想到我将不得不去重抄一遍笔记而要花费的时间，又临近期中考试，我差点再次站起来。我瞪着访客，目光充满憎恨，上帝允许我多憎恨，我就有多憎恨。

我是个傻瓜。为什么要开门？我在亚特兰大这儿有个非洲裔美国人朋友，只是朋友，叫玛丽，她一定会为此大笑的。不到一周前，她就在这个房间里，坐在沙发上，我们和阿科尔·阿科尔三人一起看《驱魔人》。阿科尔·阿科尔和我想看这部电影很久了，我们都对魔鬼主题有兴趣，我承认驱魔这个概念迷住了我们。虽然我们自觉信仰坚定，也受过完整的天主教教育，但从未听说天主教神父也会驱魔。看了片子，我们都被吓坏了。阿科尔·阿科尔连开头二十分钟都没敢看完就回自己房间，关上门，打开立体声音响，做他的代数作业去了。电影里有个镜头，有人在外面敲门，这预示着不幸，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暂停了电影。玛丽很有耐心地叹了口气，她已经习惯了我走路或开车时停下来问个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人在高速公路安全岛上乞讨”，“那幢楼里每个办公室都有人吗”等等。那时我问玛丽在美国有人敲门时谁去应门。

“你是想问什么？”她问。

“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问。

她嘲笑我。“是男人。”她说，“男人是保护者，对吧？当然是男人去应门。为什么问这个？”

“在苏丹，”我说，“男人不可能去，总是女人去应门，因为来敲门的总是找男人。”

啊，我发现又掉了一颗牙齿。那两个朋友还站在窗口，不时撩起窗

帘，看到警察还在那儿，就咒骂几分钟，然后垂头丧气地再次窥探。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好奇停车场的那个警官为什么事而来。我开始生出希望，也许他其实知道抢劫事件，只是为了避免对峙而在等那两位朋友出去。可是，为什么他会明着现身呢？大概警官在忙着调查 C4 单元的毒贩？但住 C4 的是个白人男子。我能确定的是，和警官谈话的是与我隔七个房间的 C13 的埃德加多。埃德加多是我的朋友，他是个修理工。在我们做邻居的两年里，据他估计，他帮我省了两千两百美元的汽车修理费。作为回报，我开车送他去教堂，去上班，去北迪卡尔布购物中心。他自己也有车，但不愿开。我看见他的车轮毂上至少有六个月没安轮胎了。他喜欢修自己的车，也不介意修我那辆二〇〇一年的卡罗拉。埃德加多在修我车时总是要我给他解闷。“讲些故事吧。”他说，他不喜欢收音机里的音乐。“这个国家哪里都放北方音乐，就亚特兰大除外。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不是个音乐迷的城市。给我讲个故事吧，瓦伦蒂诺。和我说话，和我说话，讲些故事！”

他第一次要求时，我就讲自己的经历，从叛乱分子第一次抢劫我父亲在马里尔拜的店铺讲起。那时我六岁，叛乱分子在我们村里出现的时间与日俱增，他们最终都会加入苏人解。多数人忍了，有些人则反对他们。按当地标准，我父亲是个富人，他在村里有一家杂货店，在几天步行路程之外还有另一家店。他自己就曾是叛乱分子，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则是生意人，不想惹麻烦。他不要革命，也不和喀土穆的伊斯兰人争吵。他说他们远在半个世界以外，并没有烦扰到他，他只想卖谷物、玉米、罐子、织品和糖果这些东西。

有一天，我正在父亲店里的地上玩，头上传来一阵喧闹声，三个男人要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中两个端着步枪。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叛军，而叛军会带来一个新苏丹。

“不，不！”埃德加多说，“不要讲打仗，我不想听有关战争的，我每天读三份报纸呢！”他指了指车下铺开的报纸，报上沾了润滑油，已变成褐色。“那些我看够了，知道你们的战争。讲些其他故事吧，讲讲你是怎